

真實世界的經濟學

——中國發展的真實世界

周其仁著

真實世界的經濟學

作者 周其仁

書法 周慧珺

總編輯 葉海旋

編輯 王陳月明

助理編輯 譚芷茵、沈楓琪

設計 趙綺媚

出版 花千樹出版有限公司

E-mail : arcadia@netvigator.com

印刷 利高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 二〇〇三年四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ARCADIA PRESS 花千樹

真實世界的經濟學

——中國發展的真實世界

周其仁著

周其仁
畫

給
父親和母親

代序：獵人的風采

周其仁是北京大學最受歡迎的教授，身兼兩職，飛來飛去，也是浙江大學最受歡迎的教授。五十二歲了，他的出身與我的大有雷同之處，而大家對經濟研究的興趣更為相近。

一九六六年在上海初中畢業，跟着遇到文化大革命，沒有讀高中（我也沒有），六八年下鄉勞動十年，其中七年半是打獵生涯（我釣魚七年半，雷同也）。打獵也是農業，但比種植或飼養遠為刺激精彩。其仁打獵，每天在荒山野嶺奔走五十公里（我是坐着下釣的），有期望，鍛煉了耐性，磨勵了好奇心。

一九七八年，二十八歲，其仁考進了中國人民大學（我進大學是二十三歲），八二年本科畢業，之後用了七年時間參加農業研究與中央改革政策研究。一九八九年到美國去，學了九個月英文，九〇年在芝加哥大學呆了一年，然後轉到我的母校——洛杉磯加州大學——攻讀博士，九六年到北大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任教。在洛杉磯攻讀時，他曾任駕駛司機，這與一九五八年我在多倫多作過計程車司機類同。

周其仁今天教的是他讀初中及打獵時我參與發明的新制度經濟學，而他的研究是以實地調查為主，興趣與取向皆與我不謀而合。釣者負魚，獵者負獸，難道其仁和我都為着欠了些什麼而選走真實世界的路？

作中國經濟的實地調查，其仁和我同步起於一九八二年。但我大部分時間身在香港，除了一年幾次到大陸巡視，一般是遠看廬山，或邀請在北京搞經改的朋友到香港來傾談一下，而香港商人到大陸投資的經驗，時有所聞，每天都在變。是的，當年我是以置身事外的觀察而寫成

《中國的前途》與《再論中國》等書。

周其仁呢？他身在廬山，調查研究是落手落腳的那一種。我是橫看成嶺側成峰，他是近看小橋流水、花草竹石。我宏觀，他微觀。重要的是，我們的宏觀與微觀合併起來，沒有不吻合之處。

二十多年來中國開放改革的發展，是人類歷史絕無僅有的寶貴經驗。釣者與獵者遇上，當然見獵心喜。是時也命也運也，我們掌握着的經濟學知識，是有關產權與交易費用的新制度經濟學。一個以筆為竿，一個以筆為劍，寫下了不少將來的經濟歷史學者不會忽略的隨筆小文章。

都是以真實世界的現象下筆的，只是一個不知小節，論大勢，另一個小節知得多，分行業處理。

我當然推薦周其仁這本《真實世界的經濟學——中國發展的真實世界》。不是茶餘飯後，或電視廣告時間，你要翻閱的書。要不然不讀，要讀就坐下來細讀。記着，要把電視機關上了。不是娛樂讀物，有些地方有趣，有些地方沉悶。但只要你能細讀，從頭到尾讀一遍，你會對中國各行各業的情況知得很多，很深入。不是在報章或一般刊物可以學得的。作者親歷其境，實地調查，有分析與觀察力，然後忠實地以他的見解報道出來。

中國最受歡迎的經濟學教授是個獵人，文筆流暢，瀟灑豪爽，不滯於物，大有獵人的風采。

張五常 二〇〇三年四月

作者序言

本書收集的，大部分是我一九九五年回國到北大任教以後為報章雜誌陸續寫下的文章。回頭一看，時間過得很快。

論文與頭銜

回來之前，我正在UCLA要結束博士論文。一般的程序，是先過博士資格考試，通過者就去找博士論文的題目，然後經過一個國內叫作「開題報告」的門檻，開始論文寫作；論文寫出來之後，再通過一場論文指導委員會的「答辯」，就可以辦手續取得博士頭銜。但是，我所在的那個項目——我的論文方向是經濟史，由歷史學和經濟學教授組成委員會——比較特別。這個項目博士論文的「開題」與「答辯」是合併在一起的。就是說，在導師同意開題之前，你論文研究的基礎工作，甚至大部分研究工作，都要做得八九不離十。答辯一通過，學生只須把經過最後潤飾的論文分頭給委員會成員簽字，再也不要上「堂會」去「保衛」自己的論文了。

我很幸運，答辯一次過關。老師們很高興，書面寫下的意見無非肯定我的論文「有極大的潛力」。我也很高興，因為自己選的論文題目，連同提出的問題，對前人研究的評價，新的假說以及準備的資料和要採用的研究方法，一併被認可「夠博士資格」。屈指算來，那時距我進入UCLA的博士項目不到四年。

有兩位在英文上幫了我大忙的美國同學，知道我於一九八九年「計劃外」進入美國的時候

對英文還「目不識丁」，不免好奇。是的，我是進了美國才開始正式學英語的。第一年由福特基金會資助，在如詩如畫的科羅拉多州的布德鎮學了九個月的英文；第二年，經 Gale Johnson 教授的推薦，到著名的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作了一年訪問學者；第三年，就進入 UCLA。就算一個念書的天才，這樣「走」的也不算慢吧？何況我對自己考察了多年，結論是智商平平，與天才扯不上任何一點關係。這裡面的「經驗」，我將來在論文的中文版面市時，要向讀者交代。

但是，已經通過答辯的論文，後來卻「擱淺」了，一直要等到二〇〇〇年夏天我再次回到 UCLA 才辦完全部手續。本來到一九九五年底，我論文的主體章節，就已經分別寫過兩、三稿；剩下的，就是一章能夠將全文貫串起來的「導論」和一章「結論」了。本來的如意算盤，是在一九九六年暑期前結束全部論文，秋高氣爽時節就打道回府。按照過去的進度，這並不是一個冒險的計劃。其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使得我的論文在答辯通過後還擱置五年之久呢？

到北大任教

最重要的變故，是我接受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聘約，於一九九六年春季開始回國任教。知道我的人，對我回國都不會奇怪。有着十年「土插隊」外加十年「農村調查」的經歷，我是一個如假包換的「老土」。到海外「洋插隊」讀什麼博士，對我來說本來就是一個意外的「偏得」。在美國一住六年，除了對那裡的大學圖書館、高速公路和法治的印象深刻，不曾發現什麼適合於我的事情可做。回國，對於我只是一件早晚的事情，不是什麼大不了的抉擇。

但是，「北京大學」對我的吸引力，可就迥然不同了。遙想一九七八年早春時節，我站在北大荒農場一隻高音喇叭之下，一邊聽着本年高考的消息，一邊盤算着如何填寫報考志願。本來不用任何猶豫，我心目中最好的學校就是「北大」，而我對於只憑考試成績，不論其他的競爭是向來不怕的。無奈是時我的年紀已經二十又八，而僅僅在上一年——鄧小平決策恢復高考的第一年——黑龍江省的「土政策」還是規定除了一九六六年的老高三學生，其他凡超過二十五歲的一律不得報考！北京大學要不要歲數大的學生呢？我沒有把握。痛苦再三，我只好放棄了填寫北大。

因此，一九九五年秋季我收到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的任教聘約，當天就簽名表示榮幸地接受。我對自己說，當年沒有當成北大的學生，現在退而求其次，到北大當一回老師，這樣的機會怎麼可以放過？各位讀者，你要知道北大的引力嗎，不妨看看我的遭遇：在我向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發回接受聘書的信函之後，我才想起自己還從來沒有教過書，並且完全不知道能不能教書！

在北大教書，是一件過癮的事。比較下來，我以為北京大學最優良的資產是她的學生。是的，蔡元培校長開創的北大傳統和精神，至今對全國最優秀的學子——每年從多少萬高考學生中勝出的佼佼者——仍然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倘若以教授的薪資水平來考量師資水準，北大至今還比不過台灣大學、東京大學、香港大學和UCLA，但是要論學生出自「千裡挑一」的優秀，北大可以把所有這些學校都比下去。我自己深受其惠：因為學生們的口味很「挑剔」，像我這樣從來沒有教過書的，也被逼得好像會教書了。

本來，到北大任教與論文收尾工作可以並行不悖。但是，被加州理工學院的James Lee教

授——他在我離開之前告誡我回國後千頭萬緒，要完成論文難上加難——不幸而言中，我很快就「捲入」了對改革中的現實經濟問題的調查研究，而把博士論文擱在了一旁。自我思量，我的論文反正通過了答辯，已經被導師們認為夠博士水準。晚一點拿頭銜嗎？對我的學問半點影響也沒有。可是要論現實的經濟問題，我「離土」已經六年——雖然其間為了畢業論文有過數次回國的實地調查，但接觸問題的面畢竟很窄——「實感」被歲月消磨，大不如前。有機會補課，接上一點「地氣」，我是不應該拒絕的。

接「地氣」：水工研究

機會接踵而來。第一檔，是杜潤生先生要我到山西參加研究一項大型供水工程。水工，歷來是中國經濟史上的一個重點，多年之前我就有過興趣。在當代，水成為「國家所有的公共資源」，產權界定的模糊外加背離價格機制——結果只能是到處叫喊「水的危機」——是產權經濟學不能放過的一個題材。八十年代我跟了杜老參加過四省治淮會議，並在安徽王家寨親眼目睹抗洪過程中上下游「兄弟地區」之間釀出的「公地悲劇」，對治水當中的經濟和制度因素，有所感知。但是，過去從來沒有一個機會，讓我對水——尤其是黃河之水——有一個抵近考察的機會。現在杜老發話，加上山西方面當時主其事的郭玉懷先生熱情邀請，豈有不去之理？

於是，我和老友宋國青教授帶着幾位學生，直奔黃土高原而去。從一九九六年秋季開始，這項研究差不多持續了三年。雖然至今我們沒有為此公開發表過一個字，但是借着這項研究，我們對水權、水價、水市場、「國家工程」的決策和執行，以及工程建設體制等等，有了透徹

的理解。對於競爭、壟斷、自然壟斷，還有那著名的「平均成本曲線陡峭地向右下方傾斜」情景下的「定價悖論」——這是經濟學提出的老大難題，上世紀四十年代科斯對此有過重要的提點——我們可是像張五常講過的一樣，因為對一個實例下過足夠的功夫，「盲拳可以打倒老師傅」。

在本書中，收在「另眼看壟斷」欄目下的文章，其實差不多都是我參加水工研究的「副產品」。作為一個「電信經濟問題專家」——我是一九九八年秋「捲入」電信開放市場的論戰的，大部分有關文章已經收入了三聯書店出版的《數網競爭》一書——我對網絡產業經濟問題的認識全部來自於「水工」。更一般而論，大凡在所謂「自然壟斷」、「規模經濟」之上加上了「國家行政壟斷」的行為，經濟邏輯如出一轍。本書的一些文章，放膽去「碰」教育、郵政、股市，分析的思路都是一樣的，只是各業的具體約束不同，「碰」起來多彩多姿，各有各的意思。

接「地氣」：企業調查

本書另外三個欄目與企業和企業家的題材有關。那是我回國之後第二檔經濟調查——公司研究——的部分結果。說起來，我對這個課題的興趣也是由來已久。八十年代參加農村調查，最後得出為數不多的理論性結論之一，是農民的經濟出路——無論農業還是非農業——從組織形式上看，要靠基於市場契約的公司。當時認識到，在我國的傳統裡有一個先天性的缺陷，那就是靠行政等級維繫的組織很發達，靠血緣親情維繫的組織也很發達，惟獨靠自由契約

的市場組織不發達。自那時起，「公司」在我的頭腦裡揮之不去。

在美國留學期間，我對科斯的企業理論下過功夫。他那篇大學三年級在倫敦經濟學院寫就的論企業性質的大文，我讀之再三，每讀一次都有新的心得。後來到 UCLA 聽 Demsetz 教授的課，重點也是企業理論。一九九六年，我將那些個讀書筆記整理出了一篇在《經濟研究》上發表，把「市場裡的企業」理解成為「人力資本與財務資本之間的一個特別合約」。此篇筆記——連同其他回國後寫成的其他一些學術性論文，已經交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結集出版——其實是我為要開展的企業調查準備的「家庭功課」。

大約從一九九六年起，我就陸續獲得進入「真實企業」的機會。第一家考察的公司，是濟南的小鴨洗衣機廠。我現在還記得關於這家公司的一個當時聽來令我感到吃驚的數據：平均每三個生產工人就有兩名市場營銷人員。我想年輕的科斯實在了得，用「市場交易費用」來解釋企業的存在，居然可以「抓住」幾十年後中國一家他從未謀面的公司的特徵！

走進第二家公司的大門，應該是一九九七年。那是上海的「遠華電氣廠」，因為沒有市場定單，已經陷於破產的邊緣。當時上海紡織工業的形勢動人心魄：全行業五十五萬工人已經下崗二十八萬。我和周放生——他當時在國有資產管理局研究所工作，對國有企業有非常豐富的經驗——走進當時還在外灘的紡織工業局大樓去訪問朱匡宇局長的時候，左邊四個大字是「無情調整」，右邊四個大字為「有情操作」。朱匡宇對國有公司的體制病有入木三分的見地，他的談話，概括起來也是四個字：背水一戰。

背水一戰，戰出了大名堂。原來上海紡織工業局派到遠華廠「扭虧增盈」的工作組組長吳玲玲，主持了兩年人事，知道「扭虧」無望，一邊艱苦地「料理後事」，一邊準備新生。她從

「遠華」挑了一組人馬，大家從口袋裡拿出一百萬人民幣現金，與紡織控股集團拿出的一千二百萬現金，另外組建了一家「埃通有限責任公司」。原來我知道的國有公司，不以市場合約為基礎（要素都是行政調撥來的），而任何自然人與「公司」的股本都不得有聯繫。現在的新「埃通」，契約為本，經理層也是股東（雖然持股比例低了一點），這難道還不是「大名堂」？

與農村改革的經驗相一致，國有企業的改革，也是在市場競爭的壓力下由一些先行者背水一戰「戰」出來的。將貨比貨，我為什麼還要對那些不關痛癢的「說法」和花拳繡腿的「理論」浪費時間？要研究企業和企業改革，拿自己的「家庭功課」試試對真實發生的事件有無解釋能力，再拿更多可觀察的事實來檢驗「似乎有解釋力的理論」，這樣來來回回、外加一點「一般化」——就是總結、概括、抽象、提煉——的努力，我們還能不長見識嗎？

於是我看公司看上了癮。有一段時間，只要山西項目沒有事，我在北大下了課就出差看企業。但凡遇到可以刨根究底的機會，我們一個也不放過。有一次，聽說科龍的創業老總潘寧被請到了石家莊，我凌晨三點從北京起身，驅車在早飯前趕到他的住地，上午聽他對河北的企業家講科龍的歷程和他的企業理念，下午——天助我也，科龍駐石家莊的車子沒有辦妥進京證——由我開車把潘總送到首都機場回香港。有此交情，你說我後來研究科龍還不是「易如反掌」？

另外一次，到合肥調查一家上市公司。風雪將飛機「逼降」在南京，我等一干人坐汽車在結了冰的路上走了十四個小時才趕到公司。對上市公司的調查一般比較困難一點，那一天看我們「長途奔襲」只求一談，接待人員動了惻隱之心，對我們多講了一些話。

為了避免企業裡管事的見了「北大老師」難免的客氣和敬而遠之，我甚至「混」入聯辦投

資管理公司，和那裡的同事們搭伴調查公司。聯辦投資有幾位專業人員，做公司引資、融資和重組業務有十年以上的經驗。從他們那裡學到的「看公司」的本事，我相信現在哪一家MBA也教不來的。另外，通常受了公司的委託，並且簽了保密函，調查就比一般的「大學研究項目」可以深入許多。當然，參加者要利用這些調查資料也要受到限制。不過，搞清楚問題是第一位的，發表是第二位的。為了增加發表機會而寫一些自己都不甚明白的「大文」，不可取也。

立足「真實世界」

以上交代的其實是本書的「生產過程」。我早就知道，自己當不成象牙之塔裡的學問人。這不是說，我不好讀書。讀書是我所好，但還必須到書外的真實世界裡求其解。

因此之故，我最喜歡的經濟學家是科斯和張五常。科斯是直截了當將「真實世界」的經濟學與「黑板經濟學」——那些徒有「科學」的外表，其實是空無一物的皇帝新衣——對立起來的學者。我在為天則研究所一項制度變遷的實例研究寫的書評裡，大段引述過科斯關於經濟學研究方法的見解。很抱歉，因為天則同人們的學術味道很濃，我的那篇書評也就寫的「不適合」收入本書了。但是科斯本人關於研究方法的思想，是「淺」得所有普通讀者都可以瞭解的。讓我引證幾段吧：

—— 科斯主張，經濟理論賴以成立的前提性假設，不但應當是「易於處理的」，而且必須是「真實的」。

—— 他批評，「當經濟學家們發現他們不能分析真實世界裡發生的事情的時候，他們就用

一個他們把握得了的想像世界來替代。」

——他身體力行：「我嘗試着從工廠和公司的辦公室，而不是從經濟學家們的著作裡找尋企業存在的理由。」

我以為，科斯做出的工作，與他陳述的研究方法是息息相關的。

張五常關於研究方法的論述更加可圈可點。順便提一句，我是一九八五年從北京一位朋友「私印」的《中國的前途》那裡知道張五常的大名連同產權與合約理論的。從那時起，凡是我找到的張五常作品，我一字也不曾放過。因為「同文同種」的關係吧，我讀張教授的著作，得到的啟發是最多的。一點也不奇怪，張五常的生活方式，也是對真實世界裡的學問着迷。他對亞洲農業的各種市場合約下過的功夫，行內都是知道的。除此之外，他研究過養蜂、漁業、灘塗養殖、美國的石油、發明專利和反壟斷官司，香港的計件工資、電影院的座位和票價、大陸的承包制和「印度綜合症」。更加難能可貴的，是他頂着香港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的名銜，連續三年除夕之夜在香港街頭賣桔！

我們還是聽聽他本人怎樣說經濟學的研究之道吧：

——任何經驗科學的發展都可以用以下標準來判斷：它的假說被確鑿的事實檢驗了多少次？按照這個標準，經濟學可能並不成功。經濟學者們一直願意接受空想的理論，對事實和數字漫不經心，不願意檢驗他們所要指明的東西的含義。

——人們普遍抱怨經濟學家之間常常有太多的不同意見。我的觀點是，他們經常太容易就未經檢驗的理論和未經證實的證據取得一致意見了。

——經濟調查所需要的資料並不是在建好的實驗室中產生的。社會本身就是一個「實驗